

李乡浏文稿选

李乡浏 著



东方文艺出版社

李乡浏文稿选

李乡浏 著



东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乡浏文稿选 / 李乡浏 著

北京：东方文艺出版社，1999.11

ISBN7—80150—195—5

I. 李 … II. 李 …

III. 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9)12126

李乡浏文稿选

李乡浏 著

*

东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开封时代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印张 100千字

1999年11月第一版 1999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7—80150—195—5 / I.11

定价：1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夫妇近影

作家简介

李乡浏，笔名里斌、严如钱。福建长乐沙京上李村人。1955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福州市工人业余大学中文教研室、政文系主任、副教授、校党组织副书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93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特殊津贴。

主要著作：儿童文学集《小杜鹃》（1957年上海少儿出版社），《白鹭》（1957年上海少儿出版社），《松鼠》（1958年福建人民出版社），《深林山野纪事》（1985年福建少儿出版社）。

文学札记《中学诗文释汇》（1987年福建人民出版社），《鲁迅作品答疑》二册（1990年甘肃少儿出版社），《中国现代作家笔名考释》（1996年艺苑出版社）。

文学评论集《诗论与品》（1994年东方文艺出版社），《李乡浏评论选》（1997年艺苑出版社），《李乡浏文稿选》（1999年东方文艺出版社）。

散文集《文坛剪影》（1991年甘肃少儿出版社），《作家忆影》（1996年德宏民族出版社），《书林印影》（1998年现代文艺出版社）；《揽镜赋》（1993年香港新世纪出版社），《李乡浏散文选》（1995年艺苑出版社），《李乡浏随笔选》（1998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诗和散文诗集《心笛》（1995年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小说《嘉峪关前——林则徐别记》（1996年艺苑出版社）。

《林祥谦的故事》（1999年海峡文艺出版社）。

主编《海峡民风》民间故事集（1991年福建少儿出版社），《福州诗咏》诗集（1998年鹭江出版社）。

目 录

- 代序：“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
——学习邓小平关于文艺论述的笔记……………（1）
- 试谈《中国俗文学史》及其贡献……………（5）
- “五四”新文学和福州作家群……………（12）
- 略说福州文学50年历程及其思考……………（17）
- 漫谈“独创性”……………（24）
- “哲理诗情共短长”
——读《六庵诗选》后……………（30）
- 郭风散文的阅读笔记……………（32）
- 许怀中散文阅读札记……………（38）
- 许怀中的鲁迅研究散论……………（45）
- 生活·立意·品味
——“三泽杯”品味人生散文评奖漫话……………（56）
- 略谈吴孝桢的随笔散文的特色……………（62）
- 新时期福州建设者的赞歌
——我读报告文学《冲天而起》……………（67）

“关心下一代”与文学的追求	
——陈月华《苦旅》印象记·····	(73)
现代格律诗尝试的新收获	
——《任越现代八行诗选》随想·····	(76)
《我的心在中国》序·····	(81)
林秋明《坚守风景》序·····	(85)
历史·演义及其它	
——林国清的《闽王演义》漫议·····	(89)
谈诗的意境创造及其它	
——林秉杰《夏日的梦》随感·····	(93)
散文的情思和文采	
——郑春芳《父亲的教鞭》印象·····	(97)
《周易》研究的新成果	
——简评《周易原理与古代科技》·····	(102)
《伸蒙子》初探·····	(106)
《五人墓碑记》的几个问题·····	(110)
《狱中杂记》的几个问题·····	(117)
吐属清婉自一家	
——王又点的词作略说·····	(121)
谈写作教学的观念更新·····	(125)
论文的“理论色彩”及其它·····	(136)
鲁迅论读书与自学·····	(150)
后 记·····	(154)

. 代序 .

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

——邓小平关于文艺论述的笔记

邓小平同志关于文艺论述，用语虽然简朴明快，内容却博大精深，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努力贯彻的。他《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曾有一段精辟的阐述：“要教育人民，必须自己先受教育。要给人民以营养，必须自己先吸收营养。由谁来教育文艺工作者，给他们以营养呢？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只能是：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这是邓小平文艺思想的一大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和贡献。

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从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论述的“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为了人民大众”，因为“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士兵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就是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邓小平的文艺思想，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部分，是结合中国国情，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也是标志着中国文艺运动在新时期的实践经验的总结。中国文艺实践既有代代相承的一面，它不是静止的，僵化的，而是随着社会衍进和文艺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邓小平文艺思想就是新时期社会生活发展的产物。

“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指文艺的人民性，强调文艺必须表现人民的生活，首先要描写人民的形象和品格。邓小平同志指出“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设，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二指文艺的方向性，强调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我们认识新时期文艺发展，评价作家作品的理论原则之一。邓小平同志指出“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这不仅阐明了新时期文艺的方向，而且促进了文艺和人民生活的紧密联系，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三指文艺的原则性，毛泽东同志早已提出的看其以“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为原则，强调从历史时代的特点和作家作品的实际出发，看其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愿望，而决定对作家作品的评价。邓小平同志

倡导“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为此，“必须自己先受教育”“必须自己先吸收营养”。文艺工作者作为教育者必须自己先受教育，自己先吸收营养，其谁来担负这项光荣的使命？就是人民。人民孕育了文艺工作者，人民抚育了文艺工作者成长，人民提供了文艺工作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活源泉，以期创作繁荣，成果累累。“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因此，邓小平同志言简意赅地概括了“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的科学论断。

“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这是邓小平文艺思想的总体性一大特色，这一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以适应新时期时代精神和人民愿望的需求，既显示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原则性，又体现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可操作性，既显示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传统原则，又体现出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形势，指导中国文艺运动。所以，邓小平文艺思想突出了自由创造与科学性相结合的特色。既阐明“我们的党，历来是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与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与学派的自由争论”的原则，又论述“要防止和克服单调刻板，机械划一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的重要。既指明“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又号召“文艺题材与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这样鼓励了文艺工作者自由创造，又显现文艺管理方法既能从宏观上控

制，又能从微观上调整。因为，文艺工作者必须“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就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深入生活，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完成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的使命。这样才能“根据我国历史新时期的特点，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才能写出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

1994年5月23日《福州晚报》

试谈《中国俗文学史》 及其贡献

《中国俗文学史》作为我国民间文学史的撰著，属于首部。原书最初出版于1938年间，距今60年。这部史书1954年7月，北京作家出版社根据商务印书馆的纸型重印，第一版印数一万册，很快售罄；1957年12月再版一万五千五百册，到了60年代，已难购到。80年代初，重印一次，早已脱销。何以这部史书引人瞩目呢？《中国民间文学大辞典》（姜彬主编）评述：“本书是作者为建立中国俗文学史体系而作的开拓性著作。”这样一部民间文学史研究专著，出自闽籍文学家郑振铎的笔下。

郑振铎（1898—1958）笔名西谛、郭源新。福建长乐人。早年参加“五四”爱国运动，从事新文学的工作，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创始成员，不论文学创作，还是中外文学史的研究，都有卓著的建树。他历任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暨南大学教授，50年代初出任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及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会长等职。他不仅对中外文学艺术的研究贡献突出，而且对中国民间文学资料的搜集和研究贡

献突出。《中国俗文学史》面世，确是具有开拓性的，因为，他拥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渊博的中外文学史知识和善于思考的立论，才能建立中国民间文学史体系，从而填补了中国文学史研究中一个悬而未决的空白。

当然，郑振铎的文学活动是多方面的。他作为闽籍学生代表参加社会活动，1919年11月与友人创办《新社会》杂志，后应上海商务印书馆高梦旦之聘，南下在该馆编译所任职。1920年11月，他与沈雁冰、叶圣陶等共同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主倡文学为人生的现实主义。1923年后，长期主编《小说月报》。他的文学建树，包括诗、散文、小说、译著和中外文学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他翻译印度泰戈尔的小诗，影响了冰心创作了《繁星》和《春水》，至今仍为文坛美谈。1932年出版《中国文学史》（插图本）在学林上独树一帜，永映丽焰。接着，《中国俗文学史》面世，以资料丰富性和研究翔实性，构成独辟蹊径的史著特色；以立论独创性和文学可读性，形成著述宏博深湛的文笔，亦显与众不同的功力。

《中国俗文学史》全书计十四章，分为二册。上册包括何谓“俗文学”、古代的歌谣、汉代的俗文学、六朝的民歌、唐代的民间歌赋、变文；下册包括宋金的“杂剧”词、鼓子词与诸宫调、元代的散曲、明代的民歌、宝卷、弹词、鼓词与子弟书、清代的民歌。中国民间文学，“江山代有才人出”，流传过程，一个历史朝代，都有一个历史朝代的文学品种，既显作为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从口头传唱到文字记录及文人润饰整理，有一个发展的进程，竟能建构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的文学形式，又显作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形

式，有一个流传的历程，竟能反映不同时期的口头文学的本貌，阐述了不同品种的文学形式的来由及其衍变，列举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为证，许多属于作者独家资料，许多属于世所仅见的引用，这是非常奇特，而又非常引人瞩目的。

《中国俗文学史》的主要贡献是什么呢？

第一、确立民间文学即俗文学观点，作者认为“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从文学史和文学现象上分析，俗文学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因为，“正统文学的范围太狭小了”。许多本来有生命力的民间文学，一旦被文人作为登“大雅之堂”的敲门砖，加以制作，便坠入了难以发展的困境。如竹枝词之类，本具清新刚健的民间歌谣特色，后为文人填词入调，逐渐失去了原有的艺术魅力。所以，作者强调俗文学因而成为“中国文学史主要的成分”，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为什么这样立论呢？主要依据：一、俗文学的特质是大众的。大众是民间的平民百姓，为大众所嗜好和喜悦的，正是最大多数的民众喜闻乐见的文学，最有“民众之口味”；二、作者是无名氏，属于民间流传之后加工更为完美的，显然称为集体创作。许多民歌和民间传说，出现许多异文，正是这个明显的标志；三、具有流动性，多靠民间口头传唱，深入大众中去；四、最富新鲜性，即使“粗鄙”，也不失“鲜妍的色彩”；五、想像力奔放，表现民间习惯和传统观念，但亦有互相模拟的缺陷；六、勇于引进新的东西，包括外来的事物和文体。总之，作者主要从文学的俗行特定，划定俗文学的范围，立论是符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实

际，填补了中国民间文学史的研究空白，这一贡献是创造性的，应当首先给予肯定。

第二、引用丰富的材料，从多角度、多方面阐述了中国民间文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全书系统地展现了中国的俗文学包括：一、诗歌，从民谣民歌到民间词曲，形式多样，品种不一，尤其叙述《诗·周南》及《召南》几篇民间的结婚乐曲，和后代的《撒帐词》等有些相同。指出《关雎》列为《诗》的首章，“琴瑟友之”“钟鼓乐之”句，分明便是结婚的歌曲。二、小说，侧重叙介宋元以降的白话小说，这一部分，作者拟与戏曲另立专著，故不介绍。三、戏曲，包括民间的戏文（传奇）、杂剧和地方戏。四、讲唱文学，详细叙述了变文、诸宫调、宝卷、弹词、鼓词等，提供了相当丰富的材料，许多还是前所未见的。五、游戏文章。作者从“书本上的”“定形的”文学现象入手，多引用书面文献中变了形的文学现象为例，进行必要的述介，而这一部分正是与众不同的，不仅材料属于仅见的，而且形成独辟史书体系，也是仅有的。如变文，作为敦煌发现的重要文书，回答了“平话”怎么会突然在宋代产生出来？“诸宫调”的来历是怎样的？盛行于明清二代的宝卷、弹词及鼓词，到底是近代的产物呢？还是“古已有之”的？这些在文学史上长久未决的问题和“疑案”，从唐代出现的变文，作者进行细致的说明。因为变文是“讲唱”的，“讲的部分用散文，唱的部分用韵文，这样的文体，在中国是崭新的，未之前有的”。非常中肯，也非常令人信服。这样著述了中国俗文学的历程，有助于人们理解中国民间文学及其和中国各时代的文艺发展的关系，有助于人们进一步研究中国民间文学的历

史。这确为作者开拓性的贡献。

第三、重视中国文学的俗行特点，划定了俗文学的范围，这不仅符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也符合口头文学传布逐步形成书面记录之后，较为定型的体例本貌。如《明代的民歌》述及“文人学士们的作风在向死路上走去，而民间的作品却仍是活人口上的东西，仍是活跳跳的生气勃勃的东西。”这正是口头文学的人民性的标志，也是民间文学之所以是文学之源的实录。作者充分肯定了“活人口上的东西”，肯定了民间文学的重要地位，这一贡献是举足轻重的。不论近代，还是现代，贬斥口头文学的现象屡见不鲜，歧视民间文学不登“大雅之堂”的言论也非少见，而作者著述这部史书，能够阐明自己的见地，能够冲破传统轻蔑口头文学的习惯势力的羁绊，能够一扫长久贬低民间文学的偏见，这一贡献，永存在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史册上，永存在广大群众的心中。

《中国俗文学史》作者的贡献，应当肯定。但是这部面世于三十年代著作，到了五十年代，竟然被“厚今薄古”的“棍子”打了，当时，北京等地报刊，发表了“批判”文字，否定了《中国俗文学史》的价值，否定了作者的卓著贡献。这是中国知识界面临“不平常的春天”的境况，一部书的命运，一位学者的命运，似乎便系在漫天砸地的“大字报”纸上。郑振铎为此，一再“检讨”，一再表示“接受批判”，颇显其时其书其人的处境了。有的说《中国俗文学史》的“俗文学”的说法，“抽去了作品中最本质的东西——思想内容，只从表面上‘通俗’来决定是否民间文学，这样把民间文学理解为‘通俗的文学’或胡适所说的